

■ 朱国宏 著

朱国宏学术随想

熊彼特和他的创新理论：观察世界的独特视野

治学应似沧海，深邃磅礴，临之莫测涯岸

我从不满足于已做过的研究

注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

历史可能或如何重构

马尔萨斯为何没有长眠

人口老化与心态老化

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对话

中国历史上的海外移民

人地关系与中国的现代化

“知识经济”意味着什么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及其意义

全球问题与全球化

复旦大学出版社

朱国宏学术随想

朱国宏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前 言

所谓学术随想,其实只是将平时一些非专为学术研究而作的文章结集而已。曰学术,因为虽非专为学术研究而作,但毕竟与学术研究有关;曰随想,因为虽与学术研究有关,但又非纯粹学术论文。介乎学术与随想之间的文章,或可谓之学术随想。

结集成册的这本学术随想,是我十余年来在几个不同领域用不同文体所写的部分文章。按文体类型编排,大致可分为五类。

其一是社会科学家的人物学术传记。这里收入的是当年为顾晓鸣教授主编的《西方智慧通典》一书所写的熊彼特学术传记。熊彼特是我颇为服膺的一位社会科学大师。他是经济学家,但又不只是经济学家,也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甚至还是统计学家。他的著作体大思精、博大精深,堪与马克思、韦伯等大师比肩。我在后来的研究中不愿囿于某一学科领

域而更多地涉猎多学科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与熊彼特学术思想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其二为对话。这里收入的对话系我在《人口》季刊主持笔政期间(1992—1996年)所辟专栏“与人口学家对话”的系列文章。对话的对象,有年届退休的前辈学者,也有正当其时的中青年学者;有国内培养和成长的,也有学成归来和羁旅海外的。我是受到《与经济学家对话》一书的启发而开辟这一专栏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话这种比较轻松随意的方式来反映中国人口学界对人口问题的研究,并反映人口学者的个性特征。我的做法是,先研究所要对话的人口学家的学术材料,熟悉和掌握其学术背景和研究专长,然后针对其专长的研究领域编写对话提纲,再进行对话——笔谈或面谈。我关注的问题有:人口学者为何选择人口学作为自己的专业领域,他对人口学和人口研究的理解、治学方法和学术取向,对当前人口问题和人口研究的评论,等等。我相信,这些对话大致反映了当代中国人口学研究和人口学界的概貌,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近20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发展轨迹。

其三为书评。这里收入的是已发表的为数不多的几篇书评,所评的著作大多是有关人口问题的。其中最早发表的是刊载于《读书》杂志1986年8月号

的“马尔萨斯为何没有长眠”一文,最近一篇则是为厦门大学叶文振教授著《孩子需求论:中国孩子的成本和效用》一书所作的序言。断断续续,书评主题的变化也反映了我这些年来所关注的研究课题的转移。

其四是序跋。这里收入的是我这些年来出版的专著的前言后记和我主编的著作的序跋。我在撰写专著时通常会附上一篇比较详细地阐明有关研究背景和研究主旨的自序,为的是让读者了解我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课题和怎样研究这一课题,让读者了解我的研究在该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我主编的著作则通常只介绍一些研究的背景。从这些序跋中,既可以看到这些年来我研究领域的变化,即人口—质量—国际迁移—人地关系—可持续发展—经济与社会;也可以看出我研究中所侧重的学科领域的变化,即经济学—人口学—历史学—社会学。

其五是时论。选编了一些我近年为有关报刊撰写的时论短文。

以上五类文体基本上反映了这些年来我在论著撰写之余所写文章的概貌,虽然不是全部,但也涵盖了其中的一大部分。如此结集出版,在我,不啻是一种纪念;从另一方面说,也了却了我的一桩心事,因为,这些文章非论非著,很难归入某一论集中,时日

一长,势必散佚不存。如今结集出版,便可敝帚自珍。而在读者诸君,通过这些不同文体的文章自然可以更多地了解我,但如若在阅读时因此而有所感有所得,则更是我不敢企望的。

这本随想集的面世有赖于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支持,特别是徐惠平编辑自始至终的关心、帮助和不厌其烦的选编,还有高若海总编和贺圣遂副总编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在此,我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朱国宏

1999年8月24日于沪上一缘斋

人 物 篇

熊彼特和他的创新理论：观察世界的独特视野

早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以下简称《资本主义》)一书问世之前,熊彼特就以其独特的“创新理论”(innovation theory)饮誉欧美学界了。而这部标志其“创新理论”成熟和完善的专著于1942年甫上书市,旋即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再度使他声誉鹊起,并最终确立了他在经济学界的巨擘地位,被西方尊为当代世界三四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①

和同时代的其他经济学泰斗相比,熊彼特无论是其人还是其理论体系,都是相当独特的。在经济学领域,熊彼特以其别具一格的“创新理论”而驰名,但他既不属于任何一个经济学流派,最终也没有形

^① 培尔特·霍绥力支：《帝国主义和社会阶级》“引论”，1955年英文版。

成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熊彼特学派”，他本人则被誉为“不成学派的大师”。^① 此其一。

其二，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的研究视野却远远越出了经典经济学的苑囿，使他不独在理论经济学领域享有盛誉，而且在计量经济学、经济史学等领域负有盛名。此外，他还以熟悉历史、精通数学、在政治学和社会学方面有深厚造诣而著称，被后人称颂为“博学多才”、“名列前茅”的“社会科学家”。^②

其三，由于他是一位“并不拥护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者”，^③ 使得他的理论既不受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青睐，又不受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倚重，从而使得他生前未能获得像凯恩斯那样倍受宠幸而封官加爵的“殊荣”，最终仅仅伟大于学术界的方圆之内。

最后，与“凯恩斯革命”和“凯恩斯时代”厮伴其人不同，“熊彼特革命”和“熊彼特时代”是在熊彼特离世后多年才初现熹微的。

熊彼特何许人也？其理论独在何处？特在哪方？

① 西摩·伊·哈里斯编：《熊彼特——社会科学家》，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英文版。

② 西摩·伊·哈里斯编：《熊彼特——社会科学家》，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英文版。

③ 熊彼特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中文版。

1. 笔墨春秋 学者人生

1883年2月8日,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今捷克摩拉维亚州)特里希镇一个织布厂主的家庭里,一个新生命诞生了。此人,就是后来以其学术成就而彪炳史册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

对于经济学界来说,1883年也许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是年,伟大的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逝世,继之而诞生的除了熊彼特以外,还有一位蜚声天下的经济学巨匠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8)。尽管他们分属于不同的阶级阵营,然而,就其经济学成就而言,却同为划时代的大师。并且,他们之间也是有联系的,熊彼特与马克思有学术渊源上的纠葛,与凯恩斯则是运途殊异却并驾齐驱的关系。

熊彼特在特里希镇温馨的小家庭里,幸福地度过了他的孩提时代。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当他刚满4岁时,父亲溘然去世,他的童年时代开始在孤儿寡母的生活中经受磨难。七个春秋一晃而过,1893年,他母亲与当时奥匈帝国的一位高级军官结婚,婚后离开了特里希镇的家,熊彼特也随家迁徙到维也纳居住。生活环境焕然巨变。

从小镇到城市,熊彼特的耳闻目染大异其趣。倚仗继父的政治社会地位,他在维也纳进了一所贵族子弟中学。

在奥匈帝国上流社会的熏陶和贵族子弟中学特定社会氛围的濡染之下,世界观和人生观尚处于形成阶段的熊彼特,其思想性格乃至言行举止都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中学毕业后,他于1901年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由于当时维也纳大学法律系要求学生学习政治和经济,还要求通过全面的考试,这使熊彼特有机会接触经济学。正是这一接触,成为他后来踏入经济学古老殿堂的契机。

不过,熊彼特之所以放弃法律而转向专攻经济,可说是纯属偶然的机缘使然。

时值20世纪初期,经济学中的奥国学派和洛桑学派正处于鼎盛时期,而维也纳恰是欧洲大陆最重要的经济研究中心,一批深孚众望的经济学家云集维也纳,使维也纳一时间人才荟萃。他们发表学术论文,举行各种各样的学术活动,特别是奥国学派,正营筑理论体系以与马克思相抗衡,他们倡导“边际效用价值论”,大肆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置身于如此氛围之中,熊彼特为经济学的魅力

所倾倒。恰巧,在选修经济学课程时,成了奥国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庞巴维克(E. V. Bohmbawerk, 1851—1914)的学生。他对庞氏的“边际效用价值论”深为折服,而庞氏也很快发现了他的经济学天才,对他耳提面命,极力提携。

心有所钟之后,熊彼特经常参加庞巴维克和另一奥国学派代表人物维塞尔(F. V. Wiser, 1851—1926)主持的经济学专题座谈会,还参加了一个统计学研究会。在1905—1906年间选听庞巴维克讨论课时,他结识了后来以探讨“货币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而名噪一时的美籍奥地利学者米塞斯(L. V. Mises)和三位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即后来成为著名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莱德勒(E. Lederer)、鲍威尔(O. Bauer)和希法亭(R. Hiefarding)。

大学期间,他还选修了经济史学课程,而讲授者是全世界第一本以“经济史”命名的著作的作者、当时颇负盛名的经济史和统计学家殷那玛—斯特纳格(Inama - Sternegg)。在广泛涉猎经济学知识的过程中,他对洛桑学派的学说表现出特殊的兴趣,学习了一般均衡理论之后,后来竟终身服膺于仅有一面之缘的洛桑学派代表人物瓦尔拉(M. E. L. Walras, 1834—1910)。

维也纳大学的学习生涯,对熊彼特后来的影响

很大,从学术上讲,以大学时代为转折点,他的定向经济学的研究历程已经开始了。

熊彼特在大学时代师承各大名家,对他日后的学术生涯是至为重要的。这不仅使他一开始就学到了广博精深的经济学知识,为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而且由于师承各大名家,使他避免了轻信和盲从,尤为重要,使他能够在科学上做到“兼收并蓄”。

他深谙学无止境的至理,于1906年从维也纳大学毕业并获得法学博士之后,并没有急于谋生,而是当即往赴英国留学。英国是经济学的故乡。他在英国逗留期间,往返游学于伦敦、牛津和剑桥诸名牌大学,还曾虚心地登门向剑桥学派的宗师马歇尔(A. Marshall, 1842—1924)求教。

1年后,熊彼特从英国归来。不久,他到埃及开罗旅居,在神奇的金字塔下流连忘返。在这期间,他担任了埃及王后的财政法律顾问,还曾在开罗的国际混合法庭从事了短期的法律工作。

1909年,也就是熊彼特大学毕业后3年,从开罗返回维也纳后,他先是在维也纳大学获得授课资格,后经庞巴维克的推荐,到奥地利最东部的布科文省担任捷尔诺维兹大学教授。1911年改任格拉兹大学教授。熊彼特开始了他的执教生涯。

在格拉兹大学执教期间，他曾于 1913—1914 年间作为奥地利的交换学者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讲学，任客座教授，被该校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如果没有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熊彼特可能会在执教生活中终其余生。但是，战争打乱了整个世界的秩序，也打乱了熊彼特的平静生活。他在大战前夕从美国返回维也纳，在维也纳平淡地度过了大战时期。战后，熊彼特居然一改书生意气，踏上了浮沉无定的仕途。

1914—1918 年的世界大战，以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失败而告终。战后的国家经济一片混乱，通货膨胀失去控制。熊彼特先是以党外“经济专家”的身份于 1918 年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化委员会”顾问，后来又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中间派人物，经鲍威尔的推荐而于 1919 年 2 月担任奥地利共和国由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组成的混合内阁的财政部长。

在混合内阁中，熊彼特主张亲英法，反对与德国结盟，还反对工业国有化等政策，因而引起了社会民主党激进分子的猜忌。同时，他又得不到国内工商界和旧政府官僚集团的支持。结果，出于无奈，他被迫于同年 10 月辞职。他的从政为官生涯就这样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稀里糊涂地开始，又稀里糊涂

地结束了。

官场失意,熊彼特于心犹有不甘,便决定尝试经商。1921年,他出任维也纳私营皮达曼银行的总经理。然而,不知是时乖命蹇之故,还是他确实经营无方,反正,很快就失败了——在战后危机的情势下,他的银行没能幸免于破产。银行破产了,经商企图失败了,他为此而负债累累,以至于许多年后还不得不用自己的薪金来偿还债务。

仕途商路对于熊彼特只意味着灾难,他深深地体味到这一点,多年后还心有余悸,再也没有勇气东山再起。

1924年银行破产后,他不得不重返弃置已久的学术领域。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名声在外,重返学术界于他不费吹灰之力。事实上,1925年,他几乎同时接到了来自日本和德国的邀请书。他先是拟应邀到日本去任教,不久又改变主意,应德国政府教育部的邀约到波恩大学任客座教授,讲授财政学。在波恩大学任教期间,他曾于1927年和1930年两度赴美国哈佛大学作短期讲学,这可能也是他后来移居美国的潜由。1931年,他还到日本逗留了几个月。

1932年,熊彼特移居美国,加入美籍,成为美籍奥地利学者。此后直至逝世,他一直是哈佛大学的

经济学教授。

在这最后的 18 年中,熊彼特深居简出,潜心于笔耕和执教,还从事了大量的学术活动。1930 年,他还在波恩大学时就与当时世界知名的其他经济学家共同倡导成立了“计量经济学会”,在哈佛大学执教期间的 1937—1941 年,他担任了该会的第五届会长。1948 年,他被推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成为第一个以非美国人身份获此殊荣的经济学家;同年,他和其他著名经济学家共同筹设“国际经济学会”,被推举担任第一届会长,后因他逝世而未果。

1950 年 1 月 8 日,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塔科尼克的寓所里,临睡前,他还在思考着到芝加哥华尔格林基金会讲学的内容,入睡后不久却因脑溢血而在睡梦中安详地与世长辞,终年 67 岁。

熊彼特的人生历程,无疑是独特的,这种独特的人生经验反映到他的学术研究中,便是对社会经济问题的独到见地,并最终以其理论体系而在学术界独树一帜,跻身于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列。

2. 兼收并蓄 独树一帜

熊彼特的学术思想是“兼收并蓄”,理论特征是“独树一帜”。